

人文经济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表达

□杨怀川

现如今的科技创新,但同时也需要保护并传承好作为传统的历史文脉,消弭传统与现代的割裂感,而这正是人文经济学的显著特征。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不仅增强了城市发展的潜力和后劲,同时又提高了城市发展的宜居性,“让人们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

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文化底蕴

习近平总书记任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以大历史观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古老中国的“旧邦”之上展开的现代化“新命”,是从中国大地上长出来的现代化,其背后有着广阔深远的历史纵深和宽厚厚重的文化根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仁人志士们已经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进行了长时期的探讨,但是在古今中西的交冲与离析中,始终没有寻到拯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出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历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坚持“走自己的路”,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一开始就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着本质性的联系,是中国共产党将社会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三者结合而生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也必然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人文经济学强调经济与文化的结合、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内在蕴含着把经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的价值指向,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文化底蕴,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滋养和推动作用。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实践中,经济与文化特别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赋予了经济发展的民族特色和人文精神,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如“经世济民”“扶贫济困”“讲信修睦”等思想观念和传统美德为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引领,引导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社会氛围。而依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推动文化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打造出文化消费新的增长极。比如,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指出“特色苗绣既传统又时尚,既是文化又是产业,不仅能够弘扬传统文化,而且能够推动乡村振兴”。此外,“天人合一”“物物而不物于物”“与人为善”等人文底蕴与经济的结合,能够让区域在物质生产之外表现出文化积淀丰厚、社会关系和谐和生态环境良好等强烈的人文特征,聚集更多的创新要素和创新主体,在经济与文化交融互动中实现着高质量发展。

以人文经济学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的重要方面。人文经济学的核心要义在于:通过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内在机制,实现文化发达、经济走在前列、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三者相统一的发展样

解决“四为”刻不容缓

□张捷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鲜明地提出了解决“四为”问题,即“干部乱作为、不作为、不敢为、不善为”,“四为”问题势必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300多项改革任务要在2029年全面完成,任务重、时间紧、责任大,如果任由“四为”在那里作祟、逍遥,是会误大事的,必须从加强党的自我革命入手,紧紧依靠各级党组织的坚强力量,依靠党员干部的浩然正气,依靠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有步骤、有重点、有针对性地整治“四为”,为全面深化改革营造清朗、干净的干事环境和氛围。

“四为”的存在影响各地各级推进深化改革的全面实施。首先是“乱作为”,“乱作为”的最大危害是违背了我们党始终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方针,其特点是不从本地本部门的实际出发,不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也不听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更不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仅凭“一孔之见”或所谓的“他山之石”就心血来潮、立马拍板,其结果可想而知。其次是“不作为”,“不作为”的危害则是忘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们在其位不谋其政,“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以为只要不贪腐,就可以舒服过日子,运气好还可以得到提拔,实际上这种“不作为”所产生的效果与贪污腐败没有两样。第三是“不敢为”,“不敢为”的表现形式主要是“三怕”,怕犯错误、怕得罪人、怕完不成任务,所以他们在工作中遇事绕道走,当拍板的不拍板,有矛盾时一律“上交”,很多急事、难事因此而耽搁。第四是“不善为”,“不善为”主要是缺乏经验和能力,特别是实践经验,当攻坚克难时,他们找不到突破口,当需要真刀真枪地实干时,他们还在照本宣科地读文件,以至于他们负责的工作进度与兄弟单位的差距越拉越大。

以上我们初步分析了“四为”的表现形式和危害,实际上我们更需要从根源上搞清楚“四为”的产生原因。笔者观察,不外乎有这么几种。一是理想信念淡薄;二是错误的、扭曲的政绩观所导致;三是心中忘记了党的宗旨;四是把个人利益

放在组织和人民利益之上;五是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包括党的干部;六是无视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对全党必须深刻领悟的“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对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缺乏起码的自觉,这才产生了对党和人民事业带来危害的“四为”。

笔者以为,要全面完成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任务,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因此,当前刻不容缓的工作是要解决“四为”问题。

首先是调查研究,摸清情况。要针对“四为”在各个方面的表现进行一次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特别是要到基层去,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因为“四为”毛病的人,他们往往在领导和领导机关还表现得“不错”,如果我们的调查不深入、不具体、“不走村串巷”,就很难发现存在的问题。

其次是各级党组织要高度重视解决“四为”问题。党中央在改革决定中专门提出了这个问题,说明它不仅确实存在,而且不及时解决会贻误改革大业。各级党组织如果抓紧这项工作,且有成效,那对后面的改革将会扫清很多障碍。

第三是及时调整和交流。要通过调查研究,专项部署,及时对存在“四为”问题的干部进行调交流和,对有些已经造成危害的乱作为、不作为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进行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第四是在改革实践中不断补充新鲜血液。实际上,在改革实践中,我们已经涌现出大批敢于担当、善于创新、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把自己的智慧和心血奉献给党和人民的好干部,我们要不拘一格,起用新人,把那些迎着“暴风雨”前进的“斗士”,不断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源源不断地补充新鲜血液。

唯其如此,《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才能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机勃勃,不可阻挡!

(作者为武汉市公务员)

以法治化助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夏云娇 涂亦楠

现代基层治理体系是国家正式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的有机统一。在基层实践中,不少干部比较看重“党建+智治+自治”,甚至有人认为在“自治”中,人的作用比较重要,法的作用不那么重要,这是一种误解。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在法治层面率先突破。法治具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实现基层治理质效跃升应当运用法律武器。基层治理体系的完整内涵,当是“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

事实上,以法治力量推进社区基层自治,早在制度层面就有一系列部署。2014年《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基层法律服务”。同年,司法部出台《关于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全面依法治国和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高度,建立基层法治队伍制度,选派法律顾问、法律明白人、法律调解员参与城乡治理”。2018年,司法部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村(居)法律顾问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培育以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人员为主要力量的村(居)法律顾问团队”。2019年《关于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加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健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机制,强化并规范村(居)法律顾问的职责与服务”。

随着社区法律服务需求的不断增长,全国各地纷纷建立起基层法治队伍。一些省份通过省级党

委或者政府发布《关于村(社区)法律顾问工作的指导性意见或实施方案》;另一些省份则制定了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将村(社区)法律顾问服务纳入其中,作为关键环节;还有一些地区由司法厅(局)牵头,进行制度设计与创新促进(社区)法律顾问制度建设。目前全国各地都将基层法治队伍作为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抓手,着力提供便捷、高效的社区法律公共服务。

社区是整个社会的组成细胞,是居民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场所。基层法治在处理邻里纠纷、医患纠纷、交通事故、土地和劳动争议、环境保护以及婚姻家庭等各类矛盾与冲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提供专业法律咨询与建议,第一时间、第一现场解决纠纷,化解矛盾。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更新、小区电梯建设、外墙维修、供水改造、物业服务提质升级、物业收费等问题层出不穷。

基层法治队伍由党委政府领导,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由律师群体主动参与,为社区基层自治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公益性、普及性、便利性的法律服务。尤其在四个核心领域充分发挥作用:参与解决纠纷、支持自治组织依法治理,提供法律咨询、开展法治教育;通过开展宪法和法律的宣传教育活动,提升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法治观念,逐步培养懂守法、依法行事的良好习惯;通过引导依法治理,提高基层自治管理水平;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有效解决基层矛盾和纠纷,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

(作者单位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公共管理学院)

警惕浮躁的网红文化

□刘腾龙 陈圣军

功等同于车子、房子和票子,把“名利”视为人生终极目标。而忽视了正确的成功观应该是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勇担社会道义和社会责任是成功的应有之义。

二是形成“庸俗化”“去中心化”的职业观。在不少网红“一夜暴富”经历的诱导下,部分年轻人热衷将低门槛和高收益的网红职业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偏颇的职业观易导致青少年价值观的功利化、庸俗化和“去知识化”,也不利于国家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流动。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新时代的中国青少年应该积极投身基层、西部和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不同的领域和岗位上发光发热,实现人生理想。

三是形成冲动、盲目的消费观。网红文化日益被资本所绑架,逐利天性使得诱导消费成为常态。一些青少年消费行为呈现非理性特征,陷入冲动消费、盲目消费和透支消费的误区之中,甚至出现了以贷养贷的极端情况。

四是形成“扭曲化”的审美观。部分网红为了迎合粉丝的猎奇心理和恶趣味,进行无底线的“审丑”式创作,奉行推俗、搞怪、行丑,以丑为美、秀丑为尚、博人眼球,将文化媚俗化和庸俗化,丧失了文化本有的理性色彩和批判精神,会对青少年的审美观造成严重误导作用,比如一些青少年就追求所谓的“网红脸”而进行过度整容。

五是形成与主流文化相抵牾的观念。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网红文化具有穿透性、互动性和活泼性,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在移动自媒体时代,青少年易被淹没在碎片化的信息浪潮中。相对于主流文化倡导的家国情怀、理想信念、无私奉献等价值理念,网红文化所传达的是娱乐至上、虚无主义、利己主义等消极价值理念。长期在这种网红文化的影响下,会逐渐解构青少年已有的理性思维和文化认知。

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环境

引导网红文化健康发展,需要不断加强网络治理

力度,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环境。

一是综合运用法律、行政和技术手段,规制网红文化健康发展。从源头来看,主播/网红、网络平台和网红经纪公司是从源头的输出原点,所以抓住“源头治理”是治理网红文化的关键。第一,完善网络领域相关法律法规。要建立完善的网络空间法律治理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第二,加强对网络平台的行政监管,规范网红个人及网络平台的失范行为。第三,强化对网络平台的技术治理。网红文化因网络技术而兴,治理网红文化自然离不开网络技术的赋能。应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AI等网络技术对网络平台输出的各类信息进行实时监测和识别,自动过滤掉负面的网红文化信息。

二是以主流价值引领网红文化发展,增强主流文化的吸引力、影响力和凝聚力,牢牢掌握网络舆论场的主导权。第一,生产文化精品,从根植现实生活、面向人民群众、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创新内容形式、传播方式和话语表达方式,生产出一大批为青少年所喜闻乐见的网络文化精品。第二,打造主流网红。造就一批传播主流价值的网红文化,从而发挥“正能量”网红对青少年的榜样示范作用。第三,以主流价值引领商业文化和网红文化的正向发展。

三是创新学校思政教育机制,提升青少年的基本认知能力。第一,构建“大思政课”育人体制,家庭、学校、社会和政府的协同,提高青少年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水平,形成追求真善美、反对假丑恶的价值认知。第二,打造“网红思政”。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形式和话语表达,打造一批“网红思政教师”和“网红思政课”,增强思政课的实效性。第三,加强网络文化教育。要在学校思政课体系中增设网络文化课程,培育青少年学生的网络媒介素养,提高他们对网红文化的赏析和辨别能力,从而自觉抵制负面的网红文化。

[作者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青马在线

网红文化具有多面性

网红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正负效应并存。正向的网红文化具有积极的社会效应。以“知识网红”为典型代表,许多不同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投身自媒体,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或技能,为广大网民答疑解惑,满足了网民个性化、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另一方面,可以促进经济力的发展。网红经济是网红文化与经济高度融合所催生的一种新兴经济模式,主要通过“主播+广告/打赏”和“直播+电商购物”的形式来进行盈利,对于增加就业岗位、拉动地方产业和扩大消费需求等方面具有推动作用,如:“新农人”直播带货农产品等。

由于部分网红个人的思想道德素养较低和“网红”日益被资本所绑架,在“流量至上、资本至上”的逻辑支配下,为了博人眼球、赚取流量,网红文化的异化现象日益凸显,如:“网络炫富”“网络行丑”等。负向的网红文化具有消极的社会效应,主要体现在对社会大众价值观的影响上,尤其是对正值价值观养成期的青少年价值观的消极影响。

警惕浮躁的网红文化

具体来说,浮躁的网红文化容易对青少年的成功观、职业观、消费观、审美观和文化认同观造成误导。一是形成“功利化”“狭隘化”的成功观。“炫文化”是网红文化异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容易让青少年产生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将“成功”与“走红”等同化,幻想能够“一夜成名”“一夜暴富”;也容易将成功狭隘化。在“炫文化”的影响下,不少青少年将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